



英汉互译 理论、技巧与实践

■ 主编 廖国强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英 汉 互 译 理 论、技 巧 与 实 践

主 编 廖国强
副主编 刘 川 李 朝
编 写 蒋 华 严 俊
王海云 卢 威 威

国 防 工 业 出 版 社

·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解讲了英汉翻译的基本理论,并提供了各类语体的翻译特点与技巧。全书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践,学以致用,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分析和练习,便于读者自学。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英语和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材,亦可供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互译理论、技巧与实践/廖国强主编.—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10
ISBN 7-118-04759-7

I. 英... II. 廖... III. 英语-翻译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334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frac{1}{4}$ 字数 39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前 言

中国加入 WTO 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新繁荣,促进了对中外文化的又一轮全方位的、大规模译介活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读者对翻译类书籍的需要,我们编写了此书。

本书主要讲解英汉翻译方面的基本理论,并融合了英汉、汉英双向翻译技能、技巧与我国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商贸、法律、旅游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书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践,学以致用,紧跟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分析和练习,对希望提高翻译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切实的帮助。

全书共分四大板块,每个板块又分若干章节,选材广泛,内容新颖、翔实,涉及面广,有如下特色:(1) 既有最新的前沿理论信息,又着重多行业翻译实践,实用性强。(2) 英译汉、汉译英、英汉口译融在一起,设计独到。(3) 多数部分采取英译汉、汉译英同章比较讲解,与那些单独分开的英译汉、汉译英材料相比,读者更易掌握,效率高、省时。

本书既可用作全国各类高等院校、中专学校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也可成为涉外行业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英语爱好者的得力助手,同时对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研究具有积极的参考指导意义。

每章后均配有适量练习,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公文、函电、讲话、广告、商标、导游词、科技文献、产品说明、合同/协议、法律文书、谚语、成语、典故、最新流行词语等丰富内容,并附以答案,便于读者对照参考或自学,有针对性地锻炼和提高英汉互译的能力。

由于编写时间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译界同仁批评指正。

编著者

目 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中西方翻译史回顾	1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简介	1
第二节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4
第三节 西方翻译史简介	7
第四节 西方翻译理论概述	9
第二章 翻译的性质、分类及基本原则	13
第一节 翻译的性质	13
第二节 翻译的分类	14
第三节 翻译的基本原则	15

第二编 翻译的基本技能

第一章 语词的翻译	18
第一节 英汉词义的理解和选择	18
第二节 词的引申	26
第三节 词的增译和省译	29
第四节 词的转换	35
第五节 词语翻译的变通手段	40
思考与练习	44
第二章 语句的翻译	47
第一节 英语定语从句和汉语定语的翻译	47
第二节 状语从句的翻译	56
第三节 被动句的翻译	61

第四节	其它结构的翻译	69
第五节	长难句的翻译	73
第六节	标点符号的处理	80
思考与练习	82
第三章	语篇的优化	86
第一节	英汉两种语篇的特点	87
第二节	句际关系的衔接与翻译	91
第三节	句际关系的连贯与翻译	99
第四节	语篇的布局方式及翻译转换	104
第五节	文化语境的翻译	113
思考与练习	118
第四章	修辞格的转换	123
第一节	英汉两种修辞格的特点	124
第二节	常用修辞格的运用	125
第三节	修辞格与非修辞格的转换	141
思考与练习	148
第五章	逻辑关系转换	149
第一节	抽象与具体的转换	150
第二节	逻辑推理的判断	152
第三节	正说与反说的转换	155
第四节	因果关系的转换	161
第五节	动态静态的转换	164
思考与练习	166

第三编 各种语体的翻译

第一章	新闻语体的翻译	168
第一节	新闻语体及特点	168
第二节	新闻语体的翻译	176
第三节	流行词语的翻译	189
思考与练习	195

第二章 文学语体的翻译	197
第一节 文学语体的范围和特点	197
第二节 小说的翻译	200
第三节 散文的翻译	208
第四节 诗歌的翻译	211
第五节 戏剧的翻译	225
思考与练习	235
第三章 一般公文语体的翻译	239
第一节 公文语体的范围和特点	239
第二节 行政公文的翻译	241
第三节 商业函电的翻译	248
第四节 会议讲话稿的翻译	259
思考与练习	271
第四章 广告语与商标的翻译	275
第一节 广告文体的特点	275
第二节 广告语的翻译技巧	277
第三节 商标的翻译	283
思考与练习	285
第五章 导游词的翻译	285
第一节 导游词的特点	286
第二节 导游词翻译的标准	288
第三节 导游词的翻译技巧	290
思考与练习	293
第六章 科技语体的翻译	294
第一节 科技语体的范围及特点	295
第二节 科技文献的翻译	299
第三节 产品说明书的翻译	304
思考与练习	307
第七章 合同法律语体的翻译	309
第一节 合同法律语体的范围及特点	309
第二节 合同/协议的翻译	314

第三节 其它法律文书的翻译	318
思考与练习	320

第四编 口语翻译

第一章 口语翻译概述	324
第一节 口语翻译的工作特点和语言特点	324
第二节 口语翻译的分类	327
第二章 口语翻译的基本技能	330
第一节 口语翻译的准备工作	330
第二节 口语翻译的风格	332
第三节 口译的笔记	333
第四节 顺译	338
第五节 概译	345
第六节 机构人员的称谓翻译	347
第七节 数字的翻译	351
第八节 谚语的翻译	359
第九节 成语的翻译	362
第十节 典故的翻译	364
思考与练习	366
第三章 按内容分类的口语翻译	372
第一节 生活口译	372
第二节 导游口译	375
第三节 政务口译	380
第四节 商务口译	383
第五节 科技口译	386
思考与练习	390
附录 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	393
参考文献	428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中西方翻译史回顾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国,长期以来,各民族之间的交际以及与其它国家的交往,自然缺少不了翻译活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犹如一条历史长河,它能源远流长,永不枯竭,永葆青春,依靠的就是翻译。中国翻译的发展史正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

早在周代,就有关于翻译活动的史实记载。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中,甚至还有周王朝当时的翻译官的专门职称的记载。此后,翻译活动就一直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

中国翻译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末至宋初,在隋唐达到鼎盛的佛经翻译时期(公元5世纪~10世纪);明末清初(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西学的译介;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新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之间的联系,主要始于印度佛教文化之东传,始于佛经翻译。据《高僧传》卷一记载,东汉末期,僧人安世高于公元147年~170年遍游西域各国后抵达洛阳,将斋来的佛经译出34部,包括《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安世高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也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者的代表。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史,从译业发展的过程来分,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早期:自佛教传来以后,经过后汉、三国而至西晋。这一时期共译经书近570部,其中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则是最杰出的

代表。同时支谦还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如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以及翻译标准等问题。《法句经·序》是我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

发展时期(东晋至隋代):东晋以后,佛教翻译事业获很大发展,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共译经书 3155 部,从东晋至隋约有译家近百人,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鸠摩罗什、彦琮、道安、慧远、真谛等。其中道安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和彦琮提出的“十条八备”的翻译理论都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是一大贡献。

鼎盛时期(唐代):这一阶段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两文,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较少,往往翻译全集。译场制度在此阶段发展得更为完备。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前一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玄奘、不空、义净等。玄奘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一起号称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玄奘在二十余年间,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 75 部,共 1335 卷,译籍之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洞晓佛典,精通梵汉两文,独得传译之便。他的译文译笔精美,译风严谨,远远超过前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主张,他既不赞同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成鸠摩罗什等人的意译,而是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

衰落时期:唐代以后,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到北宋仁宗景祐年间,最后结束。至此,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经历了早期、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

佛经翻译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以上,对于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各个方面,无不发生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家不仅译出了浩如烟海的经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他们的翻译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明末清初,即 17 世纪至 18 世纪中叶,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宣扬基督教,同时也传播科学。此时,我国翻译事业拉开了科技翻译

高潮的序幕。其特点是:由宗教著作的翻译进而到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的翻译,尤其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著作。此阶段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和“中华才士”李之藻。

清末民初,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面对民族危机,图自强,谋复兴,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培养早期科学人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又一次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此次翻译高潮又可分为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和20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前的民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有:创设了外语与科学技术兼学的近代学堂和翻译机构;翻译了大批科学技术书籍。这些对清末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维新时期广设译学馆,广译西学,造就翻译人才等方面,其规模之大,其学科之广,其数量之多,其质量之精,是洋务时期的翻译无可比拟的。20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前的民国时期,以章士钊、胡以鲁、容挺公、朱自清等人代表,掀起了一场“译名大讨论”,其影响甚为深远。

在这次西学翻译高潮时期,培养和造就了自己的翻译家,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如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马建忠、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严复、梁启超、林纾、辜鸿铭、陈季同等。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界线。五四运动以前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大量西方国家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科技著作、学术名著和文学名著。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翻译作品多以介绍西方国家的带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文学作品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为主。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巴金、林语堂、朱光潜、朱生豪、傅雷等,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如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成仿吾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是五四后我国翻译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主要有李大

钊、李汉俊、李达、李立三、王一飞、艾思奇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译作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它对新的民主主义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就是郭大力译介的《资本论》。

新中国翻译时期可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们不仅重视翻译实践本身、翻译作品的质量,同时也注重对翻译理论、翻译原则的研究。在翻译理论建设和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对翻译标准的再论争,创立了“四论”(茅盾的“意境论”、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和焦菊隐的“整体论”)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同时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型翻译家,如茅盾、傅雷、钱钟书、曹靖华、焦菊隐、戈宝权、叶水夫等。因此,翻译作品的质量得到了大大提高,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也日趋统一。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否定一切文化事业,我国的翻译事业几乎处于停滞时期。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翻译事业才又开始重新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日益频繁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翻译事业的新繁荣,开始了对外国文化又一轮全方位的、大规模的译介活动,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更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在这次翻译高潮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杨宪益、季羨林、王佐良、许渊冲、叶君健等。

第二节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受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的支配。只要翻译实践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随之产生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

我国对翻译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东汉时期,支谦就在《法句经·序》中论述了佛经翻译的标准,这是我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已初见端倪,

如文中多处提到“传实”、“贵其实”、“因循本旨”的观点,其实就是“求真”、“求信”。文中提到“其传经者,当令易晓”、“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的观点,即“达”也;文中提到“其辞不雅”,实际上就是追求文字的典雅,即“雅”也。

道安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评论家,他是佛经翻译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这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是一大贡献。道安的“五失本”,反映了译家在译经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所作的变通,“失本”是为了使译文达到符合汉文规范。道安的“三不易”,则反映了译家对古梵文和古圣先贤的玄奥哲理的理解,化难为易。

鸠摩罗什的译经思想,影响深远,开创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新时期。他是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彦琮,隋代佛经翻译家、翻译评论家,他在《辨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的“十条”和对译者要求的“八备”。这“八备”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论说翻译人才素质的文字,也是彦琮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此外,玄奘在我国翻译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的翻译主张“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就是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他所立的“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世纪末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思想。在文中,他谈到了“对译者的素养要求”、“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译文与原文的‘等值’问题”等。这些有关翻译的论述,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倡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陈西滢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

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是具有创见性的。

我国 20 世纪 30 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对翻译理论做出贡献最大的是林语堂。他一生中涉及翻译理论的文章不少,但最系统、最有名的译论是 1933 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论翻译》。在文中,他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此外,在论述翻译标准的过程中,他还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美学思想,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译文应有“五美”: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

鲁迅,不但是我国现代文坛、思想界和政治领域中的一位巨擘,而且是译坛的一位主将,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从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翻译理论。鲁迅虽未写过成本的译论专著,但在其译作的序、跋、译后记以及杂文里曾多次表达自己的翻译观点。鲁迅的主要翻译观点是对翻译标准的论述,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

瞿秋白有着非常明确的翻译思想。他不仅在翻译理论上成功地解决了“信”和“顺”的矛盾,而且在翻译实践中提出了“概念对等”的翻译原则。这一翻译思想比西方译论家提出的“等值”、“等效”、“动态对等”等理论,几乎早了近半个世纪。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又是杰出的翻译家。他精通日、德、英、拉丁文等诸多种文字,一生翻译了大量作品。郭沫若的主要翻译思想是“创作论”,他认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于可以超过创作”,并且认为文学作品的“译文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越雅越好”。

朱光潜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他一生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重要代表作,近 300 万字,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译介西方美学的先驱者。在翻译理论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艺术论”,他认为翻译只要“不逾矩”,就可以“从心所欲”,就可以使翻译达到“成熟的境界”。

茅盾也是我国一位杰出的翻译家。1954 年,他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做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创造性翻译”思想,明确提出“传达原作的艺

术意境”是文学翻译的根本任务。茅盾的“意境论”翻译思想是我国文学翻译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理论。

傅雷是一位艺术造诣深湛、卓有成效的杰出翻译家，是中国的一代译界巨匠。他在我国翻译理论史上留下了著名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论。他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不仅是中国当代的一位高才博学的文学家，文论家，而且也是一位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对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著名“化境论”，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翻译理论的讨论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经历了萌芽、发展，到成熟时期，从古代佛经翻译时期的“五失本，三不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等，到后来的“信、达、雅”、“创作论”、“翻译艺术论”、“意境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化境论”等等。对此，罗新璋将之归纳、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主线。

第三节 西方翻译史简介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翻译实践活动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等，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文学活动的性质。到了古罗马后期，随着文学创作活动的减退，文学翻译也趋于消沉。

进入罗马帝国后期，宗教翻译成为西方翻译界的主流。公元405年，圣·哲罗姆(St. Jerome)对照希伯来原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成为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文本，也成了后来大多数

欧洲国家翻译《圣经》时所依据的主要原本。罗马帝国后期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翻译家是奥古斯汀(St. Augustine),他因提出在翻译中应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而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派的鼻祖。

进入中世纪后,欧洲各地开始建立起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尽管罗马教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一再要求用拉丁语翻译《圣经》,但欧洲各地用民族语翻译《圣经》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从13世纪开始,形成了用民族语翻译《圣经》的高潮。欧洲中世纪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有英国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其发展尤为迅猛,犹如一次飞跃。这一时期,除了宗教翻译外,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学和艺术等各方面。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这部译本的语言被誉为德语的典范,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学翻译的空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显得更为浓厚,不仅译者众多,翻译题材广泛,而且对当时英国的文学生活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当时英国的戏剧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当时大量翻译、介绍罗马作家的戏剧作品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密不可分的。在诗歌创作方面,托马斯·魏阿特于1557年写的《歌曲与十四行诗》,对英国诗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文学史家将1557年称作是英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在文学翻译实践和理论上成就卓著的当推雅克·阿米欧和艾蒂安·多雷。阿米欧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等对法国的文学语言产生了很大影响。多雷主要成就是在翻译理论研究上,他于1540年在一篇题为《论如何出色地翻译》的论文中,论述了翻译的几条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与后世翻译理论家所提的一些原则问题相接,多雷因此被称为西方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17世纪至19世纪欧洲各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翻译名家和翻译理论家,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和人文科学译著,其中著名的如英国的翻译理论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